



谈“作为世界体系的闽南”

随 笔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4)02-0016-05

● 王铭铭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E

各位,我是在北京工作的泉州同乡,十分感谢会议主办方给我这么个机会来开会,这给了我双重好处,一是回家看看,二是借机同各位师友讨论相关于家乡的学术问题。我发言的题目是《作为世界体系的闽南》。题目太大,短短的十几分钟,问题怎么说得清?可想而知,我的发言不会具备任何意义上的“会议论文发表”性质,幸而,我并不怀有这一目的,而只在于借这个机会来说说感想。

首先要说,作一点学术回顾。我感到,闽南不仅是今天的学问,而且也是一门有历史的学问,曾经得到先辈的重视;不仅是闽南地方学者、在台湾和东南亚的乡亲们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一门国际的学问,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历史上,除了杰出的泉州本地学者(如吴藻汀、吴文良等)之外,国内尚有张星烺(专攻中西交通史)、顾颉刚(专攻民俗学和上古史)等大师级学者对闽南地区作过重要研究。

* 本文据 2013 年 6 月 17 日作者在泉州闽台缘博物馆召开的“闽南文化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感谢陈支平、陈健鹰教授的邀请,也感谢庄小芳在文章整理过程中给予的重要帮助。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4 年第 2 期(总第 81 期)

2014.No.2(Total No.81)



在国外,闽南一样得到不少优秀学者的研究,举我从事的这行(不是很有名的学科,叫作“人类学”)。它在清末时便有一个叫作高延(J.J.M. De Groot)的荷兰人在厦门长驻八年,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之便,考察闽南风俗习惯,他的著作甚至影响了德国近代社会思想的经典导师。他主张,其在闽南之所见,尤其其中的民间宗教,乃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遗存。在一个阶段里,高氏的研究,正是西方理论家了解“中华帝国”历史与文化的主要窗口。到了20世纪中期,西方的人类学界在英国出现了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美国出现了施坚雅(W. William Skinner),这两个大师各自以不同的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前者集中研究闽南和广东地区的家族组织,对移民、华侨这些问题,也颇有探讨;后者对中国的区域体系有深入探讨,对东南沿海宏观经济区也作过专门论述。从20世纪60年代起,欧美一代人类学研究者,在斯坦福大学(Arthur Wolf)教授武雅士的带领下,汇集台湾,展开实地考察。到20世纪70~80年代,他们基于调研所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台湾民间宗教的学术著作,探究了台湾闽南人“民间宗教”的“小传统”与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批学者当下已是西方中国学人类学这一局部的台柱子。

在中国学人类学研究这一行里,我是一个后来人,梳理这门学科的历史[见我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我发现,闽南研究曾经是这门学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海外中国人类学中,甚至堪称代表一个“时代”。要跟各位汇报一下的是,我自己在介入西部民族学研究之前,一直以泉州地区的历史与民族志为主要的关注点,我曾经利用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泉州地区调查时所获得的历史与民族志资料,写作过《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8)、《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999)、《草根卡里斯玛:四个汉人地方头人的研究》(英文版,2001)、《帝国与地方世界:长时段历史人类学的中国模式》(英文版,2009)等书,在写作这些习作时,我既得到家乡文史研究方面多位先生的教导,又从以上列举的这些国外前辈的著述里获得不少启发。

说这些,意在表明,闽南研究不应故步自封,也不应缺乏自信,而应开阔眼界,有自知之明地在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里寻找自己的定位。

我认为,当下,要使闽南研究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先需要重视国内外前辈学人的相关著述,从中获得教益,通过研究,使我们的论述与这些论著相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在更系统地梳理地方学术史的同时,我们还更要花大力气整理闽南研究的非地方学术史(我指的是,若干华人学术大师的闽南论著,及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同类论著)。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接下来,我拟稍作“学术练习”,就自己所提的“作为世界体系的闽南”这个题目说说自己对闽南研究之视野的主张。

我们的“由头”是上面提到的施坚雅先生的一个看法。这位前辈于1985年当选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他的就职演讲题为《中国历史的结构》(该文刊于英文《亚洲研究学刊》第44期),内容的主要部分涉及闽南港市的轮替史。施坚雅在中国乡村社会、城市史及区域体系研究诸方面建树极高,他以中国历史文献为基础提出一套新的人类学观点。与20世纪前期冀朝鼎等前辈关于区域的论述相呼应,施氏指出,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是基于经济文化地理格局构成的,且其中心是随时间的推移而移动的。在他的就职演讲《中国历史的结构》中,他以闽南

为中心,说明中国东南宏观经济区的运行规律,用这些规律来说明中国历史的总体面貌。在这篇文章当中,施氏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历史运行周期同朝代的转变周期联系在一起。大家知道,作为一个中国的重要的经济文明中心,以闽南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宏观经济区原为古代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作为一个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之后。这个地区在北宋时期已经跟开封媲美。到了南宋,由于北方民族的南下,中国的文明中心进一步迁移到了东南,而以泉州为中心的东南宏观经济区也得以最终形成。到了明清时期,东南宏观经济区从泉州移转到漳州、宁波。之后,随着近代史的开始,这一体系的格局,又产生了变化,厦门和福州取代了泉州、漳州和宁波,成为区域中心。

在论述以闽南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宏观经济区的历史周期时,施坚雅谈到了东南沿海地区与海外世界的关系,但是,由于他关心的是“整体中国”的构成,而不是所研究区域的超区域网络体系,因此,他并没有真正触及闽南的广阔世界视野。相比之下,读史给我带来的对闽南的总体印象是,闽南不仅是一个施坚雅陈述的“中华帝国”等级森严的“地方级序”的一环,它代表的,还是一个宏大的“世界体系”。

“世界体系”这个概念,常被用来特指欧洲中心的近代世界格局,原本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烙印。在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提出相关论述之后,这一概念得到了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引申,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认为,地球上的人群,1400年之前是分居在不同地方、群体、社会、民族之有限范围中的,之后,因欧洲势力的蓬勃上升,全世界被连成一体,围绕欧洲这一中心,形成了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地带。这个“三圈”的格局实质是个地理空间性的阶级体系,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不平等制度,它借帝国主义之力而覆盖了世界,将历史上存在过的区域性政治经济体吞噬于其中。

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史的一个片段(如五口通商之后东南沿海港市的中心换位),但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全貌。以闽南为例,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别是以这个地区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宏观经济区的历史,固然也有与近代世界体系相关的这一段,但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到来之前,这个地区的视野早已极为开阔。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出现一大批研究欧洲之外的世界体系的学者,他们指出,世界体系不是一元的,近代之前的印度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东南亚世界,都不简单是“地方社会”,而堪称“世界体系”。也便是说,以往被认为只有欧洲有的“体系”,历史上在其他地区也存在过,这些体系近期也正在复兴中。我认为,以闽南为中心延展出来的体系,一样也存在,我们同样可以以闽南为中心划分出“三合一”的格局来。就其衍化的历史结果观之,大致说来,这个格局的核心地带以闽南地区为中心,向北延伸到宁波,向南延伸到粤东,构成施坚雅说的“东南沿海宏观经济区”。这个体系也有一个中间地带,这个地带到明以后渐渐成为中国移民的目的地,在此之前曾经是贯通中西的一条交通路线。大抵可以说,它北起日本的关西,主要覆盖东南亚、南亚,西到中东的波斯湾。这个地带也是闽南人最活跃的地带,它向核心地带提供进一步拓展到第三个圈子——包括欧洲、非洲、南太平洋、中南美洲等地——的通道,它向核心地带(也就是东南沿海地区)输入异乡文化。

作为诸世界体系中一个杰出的个案,闽南有几大重镇,它们都是文献名邦,文史研究一向受学者青睐,其成果若得以进一步综合运用,便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整体地认识区域中国的



世界地位。我已欣喜地看到,接续过去,30年来,泉州文史、海外交通史与华侨史的研究者们,广泛运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语言-文字学素材,对闽南的一个重要局部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出过10期的《泉州文史》及持续出版的《海交史研究》,刊载了大量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大大丰富了闽南研究的内容。然而,我们的研究也存在问题。多年来的“家乡研究”使我意识到,在不少情况下,如“闽南”的提法,存在着某些不令人乐观的倾向,例如,这一提法时常成为人们自我安慰和幻想未来的手段,有时甚至成为空洞的口号。

被动和虚无不是纠正这些倾向的良方,学术研究的积极和朴实态度,才是我们克服问题、面对困境的条件。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闽南研究必定会实现其“学有所成”的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然需要进一步拓展视野、深化分析。而这,将大大有赖于我们的“再学问”。

“问学”要避免“洋泾浜”,但也要避免因不知彼而不知己。对当下而言,我们尤其要克服自身对近期域外闽南研究成果的认识局限。

举西学(需强调,日本的汉学亦有重要的闽南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予涉及)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闽南研究论著。199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克拉克(Hugh Clark)教授的《社区、贸易与网络:3~13世纪的闽南》一书。作者指出,在闽南概念之前的闽南被称为“泉南”,这个区域自汉末至南宋,经历了经济与人口的成长,在唐宋之际,成为华夏帝国最杰出的经济文明中心。闽南的这一地位的提升,与“泉南”作为中古时期世界贸易港的地位的奠定有着密切关系。《社区、贸易与网络》一书细致地刻画的3~13世纪“泉南”宏观经济区的经济、政治、社会与人口变迁,强调指出,唐宋时期,闽南已有高度发达的海洋经济,其商业化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由是,该书修正了此前广泛存在于国内外学界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2000年,哈佛东亚研究系列出版了苏基朗(Billy K.L. So)教授的《海洋中国的繁荣、地区与制度:946~1368年的闽南模式》(中文版改称《刺桐梦华录》,李润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该书综合施坚雅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及其他历史学研究,以泉州为中心研究了闽南政治经济史的“模式”,得出结论认为:“闽南个案研究说明,中国近代以前的经济所展示的经济理性和现代经济发展的逻辑并非本质上不可相融。”(中文版,314页)2001年,荷兰有名的出版社Brill出版了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主编的《世界货舱:1000~1400年的海洋泉州》,收录了八篇社会经济史和考古学论文,对宋元时期泉州的政府、海外贸易、物质文化、城乡关系、陶瓷产业、行会、中国-印度-东南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三部西方“泉州学”论著,并没有得到我们的系统认识,但它们水平很高,从各自的侧面反映出闽南的历史模式。它们异曲同工,以语言为颜料,绘制出了一幅闽南历史的恢弘画卷,值得我们深加解读。

“闽南”两字所指,通常是语言-文化意义上的“地方”,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与方言与地方文化有关,而我们从中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闽南形象”,则更多与我所谓的“世界体系”概念有关。

这似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闽南”到底是“地方”还是“世界”?

在研究闽南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使我产生观点的摇摆,时而侧重以历史

民族志方法来看闽南这个“地方”(一旦这样做,我便必须耗费不少精力分析“地方”与“中央”之间文明的上下关系)时而又以社会经济史方法来研究闽南这个“世界”(一旦这样做,我便又必须耗费精力分析这个“世界”文明上的内外关系)。

“地方”与“世界”两种闽南形象,早已在不同西学文本中得以确立。从高延的“宗教”到弗里德曼的“宗族”,再到之后大量关于台湾闽南民间宗教的论述,呈现着闽南的一面;从施坚雅的区域周期,到克拉克的泉南城乡关系史,再到苏基朗、萧婷等的经济史,呈现着闽南的另一面。

它们也以学科为区分的线条存在于国内学术论述中(20世纪20年代张星烺对泉州展开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及顾颉刚对泉州土地神作的民俗学和历史学研究,便是一例),并且,依旧困扰着闽南研究界:我们的一些研究聚焦于闽南地方文史遗产,主要叙述闽南的地方性,另一些研究则反其道而行之,聚焦于闽南的海外交通史、港市轮替史、华侨史,主要叙述闽南的世界性。

尽管学界给出两种全然不同的“闽南形象”,但作为事实存在的闽南只有一个。

我认为,闽南是合二为一的——它正是地方-世界的典范。要理解这个合二为一的地方-世界,上述闽南论著的西式政治经济学解释,与前述历史民族志的地方“小传统”解释,或我所谓的“内外关系”解释与“上下关系”解释,面临着相互协调的任务。

2013年12月20日

修订于北京五道口寓所

[收稿日期]2014-02-26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导,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Oral Poetics Returns to the Voice”: To Start with Analysis on Oral Epic Text *Chao Gejin*

Abstract: Oral Poetics is a recently emerged label covering those research works differentiating themselves methodologically from traditional poetics generating from written literature and focusing o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oral literature, or verbal arts in general in somewhat different terms and methods. Though not widely admitted in literary circle,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n oral tradi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lkloristics,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critique, has laid down a foundation for the appearance of oral poetics. 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follow up the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oral poetics based on analyzing oral epic text.

Key words: oral poetics; poetics; text; intertextuality; oral epic; theoretical model(see P.5)